

体制变革与中国电影业发展^{*}

——以四川电影业为例

黄颖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业的运营机制从“计划”到“市场”转变,历经市场意识冲击“统购包销”的尝试改革阶段、探索市场化运营的明确方向阶段、在开放中艰难发展的改革阵痛阶段、加入世界竞争格局之后全面产业化的深化改革阶段以及“法制、数字与‘互联网+’”多元并进的“新纪元”阶段,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产业化”的创新和集聚效应不断凸显。作为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样本,四川电影业体制改革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为中国电影业发展带来了诸多启示:借力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政策,顺应市场发展趋势,在振兴文化产业的战略布局中,不断培育优化产业环境,整合本土资源优势,不断进行供给侧改革,拓展全产业链和完善监管体系。

[关键词] 体制变革; 电影业; 四川经验

[中图分类号] F224; G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2X (2019) —06—0122 (07)

[作者] 黄颖, 副教授, 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8

一、前言

作为一种舶来品,电影在中国的发展从1905年始已走过百余年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电影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已逐步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典型代表、助推中国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据《中国电影报》统计,2018年中国电影全年总票房首次突破600亿元大关、银幕总数已超6万块;截至2019年8月已突破400亿元,仅暑期档就贡献176.53亿元。中国电影业发展的每一次飞跃都与重大经济、文化等体制改革相联系,可以说每一次经济、文化等体制改革都触动了电影业经营管理体制的变革,由此释放了电影业发展的活力。1978年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电影业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进程紧密相随,不断地发展和转型。^[1]

四川电影业运作机制从“计划”到“市场”转变,经历尝试改革阶段、改革阵痛阶段、深化改革阶段以及新纪元阶段。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其“产业化”的创新和集聚效应不断凸显,制作、发行、放映三大环节日益理顺,专业化、精细化的发展趋向愈加明显和完善。四川电影业生产的主力军是1958年建厂的峨眉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峨影厂”),也是西南地区第一家电影制片机构,其发展变革亦兼具巴山蜀水的地方特色与辐射全国的典型样态,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研究意义。因此,本文以四川电影业为研究样本,尤其聚焦峨影厂经营体制变革的线索,梳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产业体制变革影响下四川电影业所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据此总结中国电影业的发展规律与经验,并提出未来促进中国电影业健康发展的变革方向及体制保障。

*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四川震区‘灾后重建’的影像表现与文化重建研究”(15Z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二、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电影业体制变革历程

1. 尝试改革 (1978~1984年): 市场意识冲击“统购包销”

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先例可循,唯有摸着石头过河,而最早触动的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运行了30年之久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这又最早从与微观经济主体息息相关的经营管理体制入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指出,当时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下放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由此开启放权让利,逐渐明确了市场意识,转变了认识、理清了思路,一系列重要的观念突围和举措实行,对众多行业(包括电影在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中国电影业的体制模式仍沿用高度集中、垂直单一、政企合一、“统购包销”的管理体制,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电影发行放映体系在呼吁改革的浪潮中却愈发不合时宜。1979年初,在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中影公司与各制片厂就体制变革、发行管理等方面展开争论。时任北影厂厂长的汪洋随后上书党中央书记处,详述现有体制利弊,要求实行产销结合,合理分配利润。这次上书很快得到峨影厂、上影厂、西影厂等制片厂的积极支持。一年后,文化部颁发《关于试行故事片、舞台艺术片新的结算办法的通知》,奏响了中国电影“求生存、谋发展”改革序曲。1979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中的“二八”留成政策反映了市场发展需求和经济规律。此外,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主体被明确规定为企业性质,结束了收支两条线的财务管理方式,转而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2]

在此期间,峨影厂还加强自身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相继出台了《关于峨影厂电影制片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厂的机构改革方案》等,^[3]这意味着改革意识的觉醒。由于经营管理活力的释放,峨影厂推出《红衣少女》《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焦裕禄》等一大批紧贴时代发展脉搏、广受好评的力作而被国内评论界誉为“战斗的现实主义”,尤其陆小雅导演的《红衣少女》获得“金鸡”“百花”和政府奖三大奖项,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经济效益开始逐步明显好转,利润从1978年的105万元增加到1984年的252.48万元。^[4]

表1 第一阶段

时间	重要体制机制改革(调整)依据	具体举措和主要效应
1978年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中国电影业沿用“统购包销”管理体制不合时宜,电影界改革意识萌动
1979年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批转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的报告》(国发〔1979〕198号);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	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文艺政策“二八”留成政策使得电影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得到了暂时性的缓解;各制片厂和中影公司围绕着电影管理、发行体制议题展开了争论
1980年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关于试行故事片、舞台艺术片新的结算办法的通知》(〔80〕文电字第1588号)	提出文艺工作总口号“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影片价格调整的方式达成协议;制片厂获利丰厚,中影公司发行国产新片大幅亏损;电影事业呈现繁荣的景象
1984年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电影业被定性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开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从表1可知,改革开放以后,电影业曾经沿用的计划经济时期“统购包销”的管理体制已不合时宜,业内改革意识萌动,触发“求生存、谋发展”的序曲,四川电影业尝试探索了一系列具体举措,带来了连年盈利的良性效应。

2. 明确方向 (1985~1991年): 探索市场化运营

这一时期是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时期,不仅对市场化运营开始“蹒跚学步”,展开了“试水式”的探索,而且进一步理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管理体制。具体到电影业,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国家从1985年起开始局部松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固定价格,探索“价格双轨制”。1987年,广电部975号文件出台,国家实行新的电影发行办法。1989年,广电部颁发《关于试行承包电影发行收入基数的通知》,通过行政手段保证一定的发行收入。1991年1月的《关于明确电影票价管理权限和建立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中,再次申明电影票价的管理归口,但也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和下放权限。国家率先在部分地区对部分新片实行“优质优价”和部分票价实行限额浮动,电影票价管理制度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操作性。

在此期间,四川电影业改革步伐加快。1985年4月,峨影厂将原宣传发行科改为宣传发行信息处,积极开展影片宣传发行的市场调查与拓展。1987年,将峨影厂划为事业性质单位,实行企业管理。1988年,峨影生产技术分厂实行经济核算,试行《责任承包经营办法》,由管理执行型转变为经营管理型。在经营管理方式进一步转变的影响下,峨影厂通过重视人才培养、大胆启用年轻人、加强市场交流与拓展等,生产了《熊猫的故事》《大凉山传奇》等一大批反映城乡改革、突出地方色彩的个性化作品。同时,也开辟了与日本、中国香港地区合拍影片的渠道。王冀邢导演的《焦裕禄》获得“金鸡”“百花”和政府奖三大奖项,成为1990年中国电影的扛鼎之作;与香港合拍的《熊猫历险记》《自古英雄出少年》《过奖》、与日本合拍的《熊猫的

故事》等，均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5]

表2 第二阶段

时间	重要体制机制改革（调整）依据	具体举措和主要效应
1985年	电影局在广州召开体制改革座谈会	运行“价格双轨制”，率先在部分地区对部分新片实行“优质优价”和一些地区的部分票价实行限额浮动
1986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电影、电视机构合并有关事项的通知》	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
1987年	党的十三大召开；按照广电部1987（975）号文件，实行了新的发行办法	明确“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放开制片厂和中影公司拷贝结算的上下限，并提供了代理发行、一次性卖断和按比例分成等诸多结算方法；峨影厂划为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
1991年	《关于明确电影票价管理权限和建立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广发影字〔1991〕13号）	重申电影票价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管理，但也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和下放权限，票价管理制度具有更大灵活性和操作性

从表2可知，总体看第二阶段，电影业由于仍在原有计划体制框架下的试水探索，实际上处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前夜”，是一种“从动性”的改良状态，但同时也为之后明确改革方向、全面展开市场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但由于观念错位、利益分配失衡、机构和人员臃肿、新兴媒介冲击等多重原因，电影市场在1986年之后萎缩，全国1/3左右的发行企业亏损。与全国情况一样，四川电影的经济效益经历了上一阶段的黄金时期之后，也开始下滑倒退。

3. 改革阵痛（1992~2000年）：在开放中艰难发展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电影业由此真正拉开了开放市场、深化改革的帷幕。1993年《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切实改变制片、发行、放映三者之间经济分配上的不合理。1994年《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明确了电影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同年，政府决定每年引进十部大片来拯救低迷的电影市场，一方面顺应市场发展趋势、改变中国电影消费市场的格局；另一方面，国产电影也因为“与狼共舞”面临严峻竞争而引发诸多尴尬。1995年《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结束了制片业的计划管理模式。之后，陆续颁布实施的“影视合流策略”（1995年）、“电影精品战略”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1996年）、组建“中国电影集团”和“农村电影放映2131目标”（1998年）、“开放境外资本投资电影”（1999年）、“电影股份制、集团化改革”（2000年）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表3 第三阶段

时间	重要体制机制改革（调整）依据	具体举措和主要效应
1992年	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发〔1992〕5号）	认定广播影视业为第三产业
1993年	《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广发影字〔1993〕3号）及其《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打破了原来电影发行权有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垄断的制度，切实改变制片、发行、放映三者之间经济分配上的不合理
1994年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电字〔94〕第348号）	明确了电影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广电部、电影局授权中影公司每年引进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
1995年	《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广发影字第〔1995〕001号）	改革了制片业几十年一贯制的计划管理模式
1998年	《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1998〕5号）；《关于组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的通知》（广发人字〔1998〕813号）	广播电影电视部改设为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提出了农村电影放映“2131”目标
1999年	《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文化部第3号令）	引进境外资本；中国电影集团（简称“中影集团”）正式建立；启动建设全国电影院计算机联网售票管理系统工程
2000年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广发影字〔2000〕320号）	提出“电影股份制、集团化改革”

这一时期，渐趋活跃的民营资本和仍然手握影片生产许可权但产量下滑的国营电影机构之间达成一种权宜的合作形式——出售厂标。1993~1994年，峨影厂与北京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姻创作了《欲霸天下》和《铁血壮士》。1997年，又与香港嘉禾娱乐事业有限公司通过民间集资方式共同发行电影《鸦片战争》，并以此成立四川《鸦片战争》影视制作公司。^{①[6]}峨影

① 电影局对这家没有单独出品权的公司首次给予了影片的单独发行权，政策方面享有同峨影厂发行此片时间等的权利。

厂注重供给端改革,不断推出优秀电影作品。如,1994年范元导演的《被告山杠爷》获得“金鸡”“百花”“华表”和“五个一工程奖”。此外,随着对外开放加深与竞争加剧,峨影厂进一步加快改革探索,强化市场意识,拓展自身发展空间。1998年1月,四川省峨眉电影发行放映院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峨影公司)成立,成为四川本土打破行政区域垄断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2000年11月,峨影公司旗下11家影院在全国率先推出“5元票价”,很快带来观影盛况,当时与峨影公司有着竞争关系的西南影业公司旗下电影院也随之降价,这一现象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争议。虽然最终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停止了,但开启了对影视产业灵活定价的认识探索。

从表3可以看出,第三阶段电影业运作机制真正拉开从“计划”到“市场”转变的帷幕,开放行业外资本和境外资本等多种措施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推动了后续“产业化”的进程,但同时市场竞争的无序和始终较低的电影产量使得电影市场的管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电影生产逐步滑向低谷,改革进入阵痛期。这一时期,四川电影探索了“5元票价”等新的灵活方式来活跃市场,也始终坚持供给端的改革,但仍处于以出售厂标的权宜合作形式来夹缝求生的局面。

4. 深化改革(2001~2009年):加入世界竞争格局之后的全面产业化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改革开放迈进了融入世界经济竞争格局的全新阶段。同年底,广电总局和文化部联合出台《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中国电影业在全球化背景下开启了更为市场化和国际化运作的蜕变之旅。2002年,修订的《电影管理条例》正式实施。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正式签署;广电总局第18号令、第19号令和第20号令开始施行,电影业的上、中、下游全面向市场开放,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渐趋形成。2004年,广电总局、商务部、文化部第21号令《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开始施行,电影首次被明确定义为一种产业,当年国产电影票房首次超过进口大片。2005年《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若干政策的通知》和2008年《文化体制改革中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出台,2007年中影网电影输出频道、中国电影海外推广网开通,进一步促进了纵深改革和对外开放。2009年,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把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表4 第四阶段

时间	重要体制机制改革(调整)依据	具体举措和主要效应
2001年	《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试行)》(广发办字(2001)1519号)	发挥国产电影发行放映主渠道,保障高质量国产片发行放映量、市场占有率和利益合理分配
2002年	《关于成立电影院线报批程序的通知》(广影字(2002)第69号)、新修订的《电影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国令第342号)	开始推行“院线制”
2003年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正式签署《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广电总局令第18号)、《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19号)、《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广电总局令第20号)、《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国家广电总局、商务部、文化部令第21号)	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全链条向市场开放,电影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组建峨眉电影集团
2004年	《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广发影字(2004)41号)、《电影数字化发展纲要》(广发影字(2004)257号)	电影业首次被明确定义为一种产业;2004年12月3日北京韩国电影展“中韩电影高峰论坛”,广电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谷国庆,公布国产电影票房首次超过进口大片
2005年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5)20号)	开放多元融资渠道并探索其机制
2006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国办发(2006)88号)	对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作出部署;推动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
2007年	《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商务部、外交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告2007年第27号)	院线开始参与制作和发行;中影网电影输出频道、中国电影海外推广网开通,为中国电影“走出去工程”提供了创新模式
2008年	《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114号)	中宣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拟定的《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和《文化体制改革中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积极稳妥的促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促进文化企业发展
2009年	《国务院关于印发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通知》(国发(2009)30号)	把包含“影视制作”等重点推进的文化产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层面

在深化改革的浪潮之中，四川按照“电影股份制、集团化改革”要求，2003年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组建峨眉电影集团，管理运营峨眉电影制片厂、四川省电影公司、峨眉电影频道、四川峨影投资有限公司、四川太平洋电影院线公司、《看电影》杂志社、峨影音像出版社等。其中，四川太平洋院线是率先推行“院线制”、建立以资产/业务为纽带、以影院为基础的跨省电影院线，在全国最早实行了员工入股制，绩效考核制度刺激了员工的积极性，2008~2012年连续五年位列全国电影院线票房排行榜前十。^[7]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峨影集团在震后24小时内即与中影集团、上影和八一厂联合筹拍《汶川168小时》，并投拍电影《汶川时间》，四川电影界产出一系列“抗震救灾”主题作品。如，由峨眉电影集团出品、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5·12汶川不相信眼泪》，由四川太平洋电影院线有限公司与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发行的《大太阳》等，为四川震区灾后的精神和文化重建迅速留存了珍贵的影像记忆。

从表4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后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促进了改革深化和扩大了对外开放。在此期间，中国电影业主要经历了两个方面的变革（集团化、院线制改革正式启动和民营力量、境外资本等向影视产业全面而快速地进军），迎来全面产业化的“黄金时期”。四川电影业也顺势而为组建峨眉电影集团，做大做强，同时探索了产业振兴的多元渠道。

5. 进入“新纪元”（2010年至今）：法制、数字与“互联网+”多元并进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拓展了电影业的内涵和外延。由于IMAX-3D制式电影《阿凡达》刷新了国人对技术奇观的认知，2012年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发布通知鼓励运用高新技术生产国产3D和IMAX、中国巨幕（CFGS）影片，同年中国也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2013年，继续出台补贴细则，强调高新技术和票房两个指标考核。2014年，“互联网基因”全面渗透到电影业之中，互联网企业全面投资电影公司，深入渗透电影制作，颠覆性地影响电影营销，甚至创造了“网生代”的电影新概念。^[8]2015年，国务院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对政策扶持、简政放权、降低门槛、加强监管、规范审查等做出规定。2017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不仅是中国电影行业的第一部法律，也是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部法律。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国家电影局”牌子。此外，一系列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秩序、促进影视精品创作的政策和文件密集出台。

表5 第五阶段

时间	重要体制机制改革（调整）依据	具体举措和主要效应
2010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9号）	促进电影产业与资本市场和行业外资本、企业的深度融合
2011年	《广电总局电影局关于促进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2011〕影字992号）	进一步规范电影产业链良性发展
201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经商参处发文《美国电影协会：中国超越日本成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国产高新技术格式影片创作生产进行补贴的通知》（电专字〔2012〕1号）	美国电影协会（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公布数据：中国超越日本，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鼓励拍摄高新技术格式影片
2014年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计数据	2014年拥有互联网背景影片的年度票房收入超过60亿元。互联网企业全面投资电影公司、电影制作、颠覆性地影响电影营销，甚至创造了“网生代”电影新概念
201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	2017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是中国电影行业的第一部法律，也是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部法律，为中国电影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
2018年	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关于电影票“退改签”规定的通知》（影协字〔2018〕10号）、《国产电影复映暂行规定》（国影发〔2018〕2号）、《点播影院、点播院线管理规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十四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有关工作的通知》（税总发〔2018〕153号）；《四川省机构改革方案》	中央宣传部加挂电影局牌子；一系列政策则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秩序、促进影视精品创作；四川省委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和电影工作，四川省电影局挂牌

当“法制、数字与‘互联网+’”成为新时代的关键词，“四川制造”的两部现象级电影发出了自己的回声：一是由英皇电影、峨影集团出品的《让子弹飞》（2010年），实现了“站着把钱赚了”的票房口碑双赢；二是由川籍导演杨宇（饺子）执导

的《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年),是电影史上首部票房冲50亿元的动画电影,其主创团队来自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设计、制作、配音等环节也均有多个成都本土制作公司、四川高校艺术类师生参与,是近年代表中国内地角逐奥斯卡奖的片目中产业意味最浓的电影。此外,峨影集团积极参与市场运作,探索多种制片生产方式,出品/发行、联合出品或参与制作了《天上的菊美》《芳华》等60余部影视作品。^[9]2016年,成都市郫县人民政府与四川传媒学院举行“府河源”影视传媒科教产业园区暨“西部环球影城”影视小镇-影视硅谷项目签约仪式,共签约项目8个、签约金额达30亿元。2017年8月14日上映的《二十二》,是由川籍导演郭柯执导、四川光影深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的关于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幸存“慰安妇”的影片,系内地首部票房过亿元的纪录电影。2018年7月,峨影集团与阿里巴巴影业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包括但不限于在影视内容制作、投资、未来智慧影院管理、互联网宣发以及衍生品等多维领域。2018年11月5日,四川省电影局挂牌。2019年8月8日上映的《红星照耀中国》,是由峨影导演王冀邢执导、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峨眉电影集团、四川新文广影业有限公司等联合摄制出品的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点影片。

从表5可以看出,第五阶段中国电影处于产业格局调整和正式迈进法制化管理环境中,商业规则和市场规范正在重建,电影作品品质提高,电影人独立制片公司与平台公司互补,市场需求分化,“互联网基因”的电影企业优势凸显,艺术院线、版权和海外市场潜力有待开发。^[10]在这一时期,多部“四川制造”精品力作贡献了产业经典案例。

三、中国电影业的未来改革发展方向:基于四川经验

1. 四川电影业发展的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风雨兼程,而电影正是文化领域中市场化程度最高、开放程度最大、发展速度最快、世界影响最突出的行业。^[11]四川电影业值得推广的诸多经验,主要体现在:

第一,电影业的体制改革紧跟市场化脚步,从最开始的放权让利、理顺制作/发行机制的企业化改革,各阶段特点明显;再到后来国家层面在推进的同时,四川电影不断地进行探索。如,峨影厂与中国香港地区、日本的合作、与民营资本的合作,勇于探索“5元票价”等,为今后在“互联网+”时代电影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优化产业环境、多元化培育全产业链,整合四川本土蕴藏的丰厚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以此推进产品的供给端改革,打造精品力作。从五个阶段看,峨影厂即使有经营上的起伏甚至衰落,但好产品从未中断过。近年来赢得声誉和票房新高的作品均与四川电影良好宽松的产业环境、政策的配套扶持密切相关。对国有电影企业实施电影股份制、集团化改革,为私营电影部门搭建创作平台,同时充分发挥本土高等院校及企业的资源优势,培育电影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使得四川电影能够不断涌现多样化的优秀作品。

第三,经济成功转型使四川电影业具有明显的消费优势。四川经济转型成功,GDP增速高于大部分省份,长期有利于作品产出的多元化供给。2018年,四川观影人次超过1亿,排名全国第三。从总票房增速来看,2018年四川电影票房增速为17.31%,高于全国15.8%平均水平,同时也高于北美7.5%平均水平。

2. 中国电影业未来的改革发展方向

虽然一系列数字和案例见证着电影业发展的活力,但仍要清醒地认识到,数量多、体量大不一定等同于整体质量高,中国作为“电影大国”与世界“电影强国”之间仍有不小差距,而四川电影业作为一个特色鲜明的地方样本,其薄弱不足与潜力空间并存,未来进一步改革发展的方向在于:

第一,认真领会新一轮体制改革文件精神,顺势而为。运用高新技术进行产业形态变革与生产创新,加大对裸眼3D/4D技术、VR技术、MR技术、全息技术、全景声技术等的应用力度,致力于让“黑马”变成“常态”。充分利用四川省已有的多个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西部环球影城”影视小镇-影视硅谷等产业基础优势,实现高新技术引领生产创新,继续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下积极探索产业形态变革与升级。

第二,在振兴文化产业的国家战略布局中,继续深挖本土特色的内容优势,不断培育并优化电影业环境、充分予以相关政策配套扶持,以此提升辐射全国、影响世界的“文化共通”软实力。从既往的成功案例看,四川电影中的优秀作品或多或少都结合了本土特色,易于占领四川市场的基础之上延伸至全国文化共通的市场,从而降低电影投资的风险。因此,应立足本土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选择认知度高的诸如“大禹文化”“诸葛亮文化”等品牌内容开发,发挥电影业高聚合性、高催化性的产业特征,加强与文旅及文创产业的融合发展,以体制变革促进产业发展。

第三,依托“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大背景,映射“精准扶贫”的成就与经验,顺应衍生消费与分众细化的市场趋势,进

行国际市场和国内中小城市、广大农村地区的双向延伸,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产业链。目前的电影业侧重于上游(生产制作)和下游(放映终端)建设,处于中游的宣发环节一直较为薄弱,且个性化、定制化、体验化的受众需求加速了“分众细化”的趋势。因此,四川电影业应审时度势,在保持既有市场容量和消费优势的基础上,多样化地开发电影衍生产业,同时拓展和完善具有“西部特色”的全产业链。

第四,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电影业监管体系成为电影业发展迫在眉睫的理性需要。应在法制管理和行业规范约束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不断丰富与补充更适用于地方电影业的管理细则与监管方式,并对未来市场及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判,为未来电影业良性、可持续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参考文献:

- [1] 尹 鸿. 从新中国电影到中国新电影的历史转型 [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05): 38-44.
- [2] 刘 阳. 新时期中国电影体制研究(1976~1993): 基于政策分析的视角 [J]. 当代电影, 2015, (01): 105-111.
- [3] [4] [5] 峨眉电影制片厂厂史办公室. 峨眉厂志 [Z]. 成都: 四川省新闻出版局, 1990. 74, 59-81, 82-105.
- [6] 唐 榕. 新中国60年电影体制与电影市场: 回顾·思考·展望 [A]. 傅红星等. 社会变迁与国家形象 [C].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0. 603-617.
- [7] 尹 鸿, 尹一伊. 2012年中国电影产业备忘 [J]. 电影艺术, 2012, (02): 5-19.
- [8] 陈艳君. “互联网+”时代的中国电影产业营销 [J]. 电影评介, 2018, (04): 57-59.
- [9] 峨眉电影集团. 集团介绍 [EB/OL]. <http://www.emdy.cn/?jitianjieshao.html>.
- [10] 尹 鸿, 李天语, 孙伊斌. 2018年中国电影产业备忘 [J]. 电影艺术, 2019, (02): 33-45.
- [11] 尹 鸿, 李 博. 用空间赢得时间, 用规模换来质量 [N]. 中国艺术报, 2015-10-30 (005).

The System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lm Industry ——Take Sichuan Film Industry as an Example

HUANG Ying

(College of Movie and Media ,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 Chengdu 610068 , China)

Abstract: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film industry has changed from "plan" to "market". It has gone through the trial reform stage, from "purchase and sale by the government" later impacted by market consciousness, the stage of exploring the clear direction of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and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opening-up policy, the stage of pain and the entry into the world competition pattern, the stage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compreh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legal system in new era", digital and "internet +".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the innovation and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industrializa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highlighted. As a local sample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the system reform of Sichuan film industry has accumulated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which has brought a lot of comparative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e film industry: relying on the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and reform policy, complying with the market development trend, continuously cultivate and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integrating the advantages of local resources, constantly carrying out supply-side reform, expanding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and improving the regulatory system in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revitalizing the cultural industry.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changes; film industry; Sichuan's experience

责任编辑: 陈 明